

中国经济： 回眸、前瞻与建言

◎ 上海财大“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提要：

2022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持稳定，全年经济总量达到121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0%，但较“两会”确定的目标增速仍有一定差距。然而，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突出、供应链产业链体系完整齐全、市场主体活力强信心足、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空间大，长期经济发展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2023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各项战略部署的开局之年，也是疫情防控政策放开后关键的一年，随着一揽子稳经济政策效应的逐步释放、房地产市场的逐步修复以及新经济增长动能的逐步增强，中国经济将释放巨大的增长潜能，全年经济增速有望向潜在增长率回归。

一、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基本态势

（一）消费受疫情冲击影响显著，管控政策调整后有望反弹。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9733亿元，比上年下降0.2%。课题组分析，疫情持续时间过长导致消费者信心和收入预期下降是拖累消费的主要原因；有效的疫情防控政策，确保就业和收入，是恢复消费者信心刺激居民消费的关键。管控政策的调整有望改变消费者对收入的长期预期，提振消费者信心，从而刺激消费市场复苏。

（二）投资增速回落，房地产投资下降幅度持续扩大，制造业投资保持一定韧性，并与基建投资共同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22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5.1%。分类别看，受疫情和预期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10.0%，降幅较上半年扩大4.6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在出口增长较快以及相关政策扶持下，同比增长9.1%，比前两年平均增速高出3.7个百分点，显示出一定程度的韧性；基建投资作为拉动投资增长和稳定经济大盘的关键力量，全年累计同比增长达9.4%，比前两年平均增速高出8.8个百分点。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叠加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资金

投放使用，投资将得到有力支持，起到稳经济的作用。

（三）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贸易顺差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2022年，中国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6.31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3.5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0%；进口总额为2.7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1%；贸易顺差8776.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扩大2016.8亿美元，增长29.8%。课题组认为中国进出口增速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第一，内外部需求持续低迷，欧美地区的高通胀及其持续的加息政策始终制约其进口需求，导致中国对欧美市场的出口速度下降；进口增速的下降主要源于国内生产需求乏力。第二，进出口价格双双回落，进一步拖累进出口增速。尽管外部通胀形势严峻，但走强的美元使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不同幅度的下降，并进一步拉低中国进口价格。第三，基数效应。2021年国内较好的疫情形势以及宽松的防疫政策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而国外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较高，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2021年进出口的

高速增长。

（四）CPI整体保持在合理区间，PPI同比涨幅回落。2022年以来，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中国物价保持平稳运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比上年上涨2%，低于全年3%左右的预期目标。2022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比上年上涨4.1%，低于2021年全年8.1%的涨幅。综合考虑到猪周期、国内外经济复苏、基数效应，以及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趋势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课题组认为2023年CPI年均增速将和2022年大体持平，可能略高于2022年；PPI同比增速将在0附近震荡徘徊，PPI年均增速将显著低于2022年。

（五）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人民币汇率双向宽幅波动增强。2022年，受主要国家货币政策预期、地缘政治局势、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加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增强，人民币表现出了较强的“弹性”和“韧性”，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不断完善。从内部环境看，中国持续优化疫情防控政策，提高疫苗



2022年度，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人民币汇率双向宽幅波动增强。图/中新社

接种率，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国内经济回稳向上的预期加强。此外，中国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并保持灵活适度的操作，实施必要的宏观审慎管理，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扩大金融开放，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从外部环境看，在美国经济通胀数据降温回落、美联储“暗示”放缓加息的背景下，美元指数11月累计跌幅超5%，推升人民币兑美元走强。课题组预估202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Y/USD继续双向宽幅波动，且波动幅度可能加大，但仍保持在合理区间。

（六）劳动力市场波动，整体呈恢复态势。2022年4月，全国失业率达到峰值6.1%，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和国家保就业政策的出台，失业率逐渐波动下降，至10月回落到5.5%，控制在目标范围以内。新增就业人数全年同比降幅最高点从6月的6.3%逐步收窄至4.21%，低于上年同期。2022年三季度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累计18270万人，同比下降0.2%。农村外出劳动力月收入为4586元，同比上升3%，年均增长2.96%，低于疫情前2017-2019年年均6%-8%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值第三季度为27650元，同比增长3.2%，年均增长5.3%，较低于2017-2019年疫情前平均水平。其中城镇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累计值分别为37482元和14600元，同比分别上升2.3%、4.3%，城乡收入差距有所减小。全国人口流动性在个别月份出现短暂恢复迹象，但复苏态势不稳。

（七）2022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灵活适度，金融市场整体平稳运行。2022年货币政策主动应对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冲击，靠前发力，11月末货币供应增速为12.4%，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为10.03%，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与货币供应增速剪刀差已持续8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低速增长反映出实体部门融资需求的疲弱，而货币供应增速的明显上升则是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大幅上升的结果。虽然在“二十条”和“新十条”等优化措施的指导下，中国居民的生产生活开始逐步恢复常态，但根据欧美和中国港台等地经验，

在疫情防控措施大幅放松之后，经济并不会立刻出现大幅反弹，经济的反弹仍需度过早期的感染高峰才会出现。预计2023年中国企业经营仍将面临不小挑战，家庭部门面临的收入增速持续放缓和债务下降缓慢等问题依然持续，且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因此，课题组认为货币政策在2023年仍有一定的降准空间，但降准绝不是唯一的政策选项，降息和多种结构性工具与降准相结合的政策组合或将发挥更大的政策效能。

（八）数字人民币的系统测试在稳步进行中，主题探索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在疫情管控放开之后，中国经济仍可能面临消费动力不足、投资信心不强等不利因素。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发放消费补贴，既能有效应对消费不足导致的衰退风险、避免资金过度流入其他领域，又有助于提高数字人民币在广大居民群众中的接受程度、培养使用习惯，实为双赢之举。近日，中国与海湾国家就未来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达成了合作协议。其中，开展油气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一举，大大加强了人民币未来在国际货币支付体系中的重要性。在跨境支付领域，中国应当继续深化改革、加大力度，保持数字人民币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国际领先地位。

（九）以推动环境政策“降成本”“提效率”助力绿色发展。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在进一步加大环境规制力度的同时控制环境规制成本，实现环境目标与经济增长的共赢。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与政治激励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环境政策的成本有效性。此外，环境质量管理方式仍存在改善空间，应通过将中央环保督察常态化等措施，对环境监管体系无法覆盖的死角查漏补缺，避免污染排放在督察过后的“反弹”，长期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换代，促进绿色增长。同时，提高公众环境监管参与度至关重要。由于空气污染物比水污染物更容易观察，长期以来公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度更高，如何提高公众对水污染信息的可得性是未来提升公众水污染治理参与度的关键。

(十) 应对气候变化, 促进健康幸福老龄化。气候变化和老龄化的加快对中国人口福利的影响愈加凸显。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3.5%, 预计到2050年将增加到26.1%。预期寿命的提高、人口结构向老龄化社会的转变对全球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课题组认为中国政府应更加重视老年人口在气候变化中受到的福利损失, 加紧制定包含气候政策考量的健康中国政策, 以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和气候战略的实施, 实现人口健康和全民幸福发展的政策目标。另外, 中国需要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不仅关注当前的老年人口, 也需通过影响早期家庭和社会资源的政策, 缓解未来的气候变化影响。而且, 建立一个全面、完善且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气候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中国宏观经济下一步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

(一) 年轻人就业困难, 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 青年就业意向失衡, 服务业低迷不振是2022年青年失业率高企不下的主要原因。2022年7月, 中国青年失业率创下了历史新高19.9%。2022年1-11月青年失业率为17.64%, 远远高于2021年的14.25%和同样受到疫情肆虐的2020年的14.19%。据报告显示, 2020年有77%的青年从事服务业, 2022年的应届生中只有11%愿意从事与农业和工业相关的职业, 青年人就业意向结构失衡比较严重。课题组分析发现, 2020年以来, 服务业的发展情况和青年失业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022年年初疫情暴发, 服务业遭受巨大冲击, 出现了连续几个月的负增长, 且疫情过后的恢复也十分缓慢, 这便造成了年轻人就业难的问题。课题组认为, 通过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让国民消费水平保持良好的恢复势头, 有利于促进服务业, 特别是餐饮业的快速复苏, 服务业的快速复苏有望在短期内有效解决

青年的就业问题。归根结底, 青年失业率屡创新高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青年普遍对第三产业抱有更好的期望和态度。党的二十大提出,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推进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重心开始转向第二产业, 如何让年轻人的就业观念和倾向也转向第二产业, 则是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根本所在。因此, 通过升级产业结构, 改善第二产业薪资收入, 完善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和企业用人需求的相互接轨, 可以促进青年就业意向的转变, 进而从根本上缓解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

(二) 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 预期的走弱, 改变了家庭部门对住房资产的追求, 家庭部门的债务增速放缓、初现缩表迹象。2022年前三季度家庭部门债务虽然继续增加, 但中长期贷款的增幅较以往呈现断崖式下降, 短期贷款的新增也不容乐观。与家庭部门的债务累积被迫降速相反, 家庭部门的存款在2022年全年呈现爆发性增长。2022年第一季度的存款额均是同期最高, 特别是第三季度, 新增家庭存款由降转升, 自疫情以来首次同比实现正增长。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 预期的减弱是理解这些问题的根本。当收入不确定性增加时, 出于对未来收入下降的担心, 预防性储蓄动机不但使得家庭部门降低消费, 增加储蓄, 而且还会降低家庭部门对流动性较差的住房资产的投资, 这体现为房价的下跌、家庭债务的下降。课题组认为, 调整优化家庭债务结构, 给家庭部门注入流动性, 是从根本上刺激消费的办法。现阶段各地实施的降首付、降利率、降买房限制等政策还是从住房需求的角度增加居民贷款。这虽然可以刺激当地政府卖地, 改善地方政府预算约束, 但由于疫情前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过度消耗了家庭的买房需求, 叠加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 家庭从住房需求端加杠杆的难度在增加, 并且这些由买房产生的新增贷款还可能会造成“房奴”效应, 拖累家庭的消费。

(三) 民营房地产企业违约率持续上升, 金融机构脆弱性再次上升。进入2021年下半年, 房地



2022年以来，中国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财政金融风险不容忽视。图 / 中新社

产行业流动性风险凸显。2022年以来，民营房企的债券违约率从2021年末的18%上升至2022年11月末的50%，增幅高达32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违约风险的上升对债券市场以及金融系统可能造成的冲击不可忽视。课题组通过条件在险价值模型（CoVaR）来评估中国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和识别系统重要性银行，模型估计结果显示，2022年以来不论是单家银行受到外部冲击时，还是银行系统整体受到外部冲击时，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溢出率的上升虽然有所放缓，依然处于上升的通道。此外，当前银行风险溢出水平在不同规模的银行间呈现分化。具体而言，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水平已上升至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且上升速度未显减缓的迹象。更重要的是，在遭受系统性风险的冲击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水平再次回升至2020年同期水平，已出现风险溢出水平下降的迹象，但其水平值依然处于2014年以来的次高位。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比例已连续18个月超过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甚至已经接近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水平，中小型商业银行在面临系统性风险时的脆弱性依然较大。

（四）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财政金融风险不容忽视。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楼市低迷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地方政府收支矛盾加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持续增加，由此蕴含的财政金融风险不容忽视。有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前提是理解其成因，从根源上来看，中国地方财政存在较大的收支矛盾，使得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举债来满足财政支出需求。为改善当前的地方政府债务状况，课题组认为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首先，应推动以分税制改革为基础的财税体制改革和当前的官员晋升考核制度，健全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转移支付制度，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发展区域经济获得财政收入，从根源上解决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其次，推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一方面，明确政府与市场关系，确定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职能事权，适度上收事权，调整分税机制，使财力与支出责任匹配；另一方面，推行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增税并行的税收体制改革，在通过结构性减税降费措施精准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未来税源增加奠定基础，并适时增加房产税、增值税、环保税等，增强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

(五) 警惕人口负增长。2022年末, 中国人口为141175万人, 比2021年减少85万人; 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 比2021年减少106万人; 死亡人口1041万人, 比2021年增加27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 比2021年下降0.75个百分点; 人口死亡率为7.37‰, 上升0.19个百分点;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 一方面是因为育龄女性规模下降, 另一方面则是年轻人婚育年龄普遍推迟、生育意愿较低、已婚女性生育率下降。此外, 新冠疫情也对婚育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在疫情冲击下, 很多人就业、收入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健康状况也受到影响, 被迫延后或取消了婚育计划。新出生人口持续下滑, 老年群体却在不断扩大, 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更少的年轻人必须担负起更重的养老压力。人口的“负增长”会给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带来极大挑战。从长期来看, 极有可能导致中国内需下降, 消费动力减弱, 储蓄和投资减少, 创新动力不足, 经济增速放缓。

三、不同情形下2023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预测

根据2022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定性判断, 课题组利用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IAR-CMM)对不同情景下的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增速进行预测。在基准情景下, 预测2023年全年实际GDP增速为5.4%, CPI增长2.3%, PPI降低1.3%, GDP平减指数增长0.9%, 消费增长6.5%, 投资增长5.0%, 出口增长9.5%, 进口增长5.7%,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Y/USD)或将在7附近宽幅双向波动。考虑到监管政策变动、疫情防控措施变化、家庭部门不确定性增加加剧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 将分以下7种情景对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增速进行预测。

情景1——假设监管放松促进企业恢复活力, 企业融资和销售经营状况好转, 将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相对基准情形增加0.5个百分点, 将带

动2023年全年GDP增速较基准情景提高0.4个百分点, 达到5.8%。

情景2——假设2023年放开二次抵押限制, 住房资产得以被盘活, 消费增速较基准增加2个百分点, 最终2023年全年GDP增速将较基准提升0.6个百分点, 达到6.0%。

情景3——假设中美贸易摩擦有所缓和, 国内生产随着疫情管控政策的取消而得以恢复, 外部需求也随着美国、欧洲经济的好转而得到提升。在此情景下, 出口增速和进口分别较基准情景上升3个和4个百分点, 最终2023年全年GDP增速将较基准提升0.4%, 达到5.8%。

情景4——假设疫情实现较快过渡, 叠加政策效应, 在乐观情景下, 对国内消费增速拉升1.1个百分点, 对投资拉升1个百分点, 进出口增速分别上升2.9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 最终对GDP拉动1.0个百分点, 2023年全年GDP增速为6.4%。

情景5——假设银行系统脆弱性再次恶化, 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遭受系统性冲击, 信用利差大幅上升、银行的信贷供给能力下降, 拖累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和国内投资。该情景下, 国内投资累计增速较基准情形将下降0.5个百分点, 进而导致2023年GDP增速较基准下降0.2个百分点, 为5.2%。

情景6——假设疫情防控政策放松后, 不确定性不降反升, 消费增速较基准降低1个百分点, 将使得2023年全年GDP增速较基准下降0.4个百分点, 为5.0%。

情景7——疫情反复, 叠加极端气候和复杂的国际环境, 在谨慎情景下, 导致国内消费增速下降2.8个百分点, 投资下降0.7个百分点, 进出口增速分别下降3.2个百分点和2.2个百分点, CPI和PPI增速各下降0.1和0.2个百分点, 2023年全年GDP增速下降至3.9%, 较基准预测下降1.4个百分点。

四、未来一段时期的应对政策与治理改革

(一) 短期应对政策

课题组根据IAR-CMM量化准结构模型, 分

析了不同情景下所需的政策力度。总体而言，从短期来看，宏观经济政策要着力“稳增长促回升、防风险保安全”，具体以“逆周期”和“跨周期”相结合的操作思路，改善市场主体信心和预期，持续增强经济内源式增长的动能，推动宏观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保持政策连续性。适度扩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加大税收抵扣和优惠，支持企业研发和设备更新投资，有效对冲私人部门需求不足缺口，加速产出缺口收敛。

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精准有力，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潜在经济增速和稳健合理的物价水平相匹配。有效发挥货币政策的调结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支持力度，着力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三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拓展新增长领域。围绕制造业重点供应链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供应链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

四是积极推进保交楼建设，降低住房按揭贷款成本，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需求，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可以考虑设立住房稳定基金，通过债权投资和类优先股投资等方式缓解房地产企业流动性困难和信用风险，进而为房地产业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五是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优先将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力度保障就业岗位，着力稳定重点群体就业，建立居民对未来收入水平的稳定预期，更大限度释放居民的消费需求，稳固内需对经济恢复的积极作用。

六是社会政策要兜住民生底线。要及时有效缓

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给困难群体造成的负面冲击，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

七是积极有效应对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稳定市场主体信心，把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确保经济活动回归正常运行轨道。同时，要加快推进老年人疫苗接种、增加医疗资源储备、重视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和卫生健康服务工作，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夯实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长期治理改革

从长期来看，归根结底地还是主要靠坚定不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必须与时俱进将改革开放的大的举措制度化、法治化，建立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让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制度而不是易变的政策，只有制度化改革才是稳定预期的关键。一个松紧适度的制度环境，而不是一个过度监管的制度环境，才更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更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无论是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还是技术发明的创新都需要具有无限的想象力，即科学基础理论的创新需要具有像“害死猫”一样大的无限好奇心。好奇心推动了整个人类的进步，而技术发明和创新成功的秘诀则是从反复失败中学习、改进直至成功。由于这种技术探索 and 创新的失败率很高，风险很大，历史和实践都表明，其主要靠民企及充分的经济自由选择 and 竞争。这样，无论是基础科学的创新，还是技术发明的创新，其共同前提和最宝贵的要素就是思想的自由、信息的自由 and 竞争的自由，而这只能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开放来达到，由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高速度的又快又好的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面对依然较大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要顶住下行趋势、全力推动经济复苏，根本在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不动摇，这特别是稳预期、增信

心的关键。唯有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市场取向不动摇，深化制度性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新的竞争优势，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有能、有为、有限、有效、有爱的刚柔相济的五有政府，而不是事事都有为的政府，才能改善营商环境及企业和民众心理预期、提振市场主体发展经济的信心，才能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及其与国家治理能力的辩证关系，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稳中求进和高质量发展，在2035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国也才能和平融入全球体系，成为受信任和支持的世界强国。

首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深化制度性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正是新时期中国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入改革经济体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坚定不移用改革的办法释放和激发市场潜力。只有同时发挥好市场无形之手、政府有形之手和社会辅助之手的各自作用，才能不断完善有利于促进资源有效公平配置的制度环境、体制安排和政策措施。尽管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至关重要性已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但许多人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发挥辅助作用的同等重要性。逐利的市场使人自私和物质化，从而需要人类社会的信仰、规范与秩序、社会捐赠等公共文化来平衡个体的自私和物质化，自助并助人。就政府与市场关系而言，政府应主要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方面，要构建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环境，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要建立市场化、制度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优化服务改革，提高服务效能，加强产权保护，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其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新的竞争优势。伴随着人口、土地等要素红利的不断减弱，迫切需要在制度层面进行更高水平的系统性开放，从而打造新的竞争优势，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当前，世界各国围绕全球经贸规则的博弈日趋激烈，新冠疫情又推高了全球经贸合作的壁垒，同时，新技术革命、数字经济的勃兴也推动新领域的规则、标准不断出台。这些都要求中国必须深化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参与乃至引领相关领域更高标准的全球性经贸和投资规则、标准的设计和调整的过程中，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促进、倒逼国内经济改革深化，在更高水平上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实现商品服务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构建共享型社会，循序推进共同富裕。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全球排位在第60名左右，要在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中实现现代化、推动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显然是很困难的。而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特别是消费的恢复和扩大，又有赖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仍然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让人民成为共同富裕的创造者和享受者，真正形成共享型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关键要处理好通过市场“做大蛋糕”的第一次收入分配和通过政府调节的第二次收入分配与社会辅助的第三次收入分配间的激励相容，并且在法治框架下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

（课题组负责人：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执笔人：李双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